



不存在的邊地婦女

文 | 林圭偵 |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

圖 | 作者提供

一、異邦女子的「神話」

在我從事考古田野的四川，向來以「辣」聞名，各式料理中不但鮮有不用辣椒者，而且有來自花椒的「麻」，常能逼死不善此道的外地人。事實上，當地人更常引為笑談的是當地女性的「辣」，這可不是在說四川很多辣妹，而是更接近個性上的潑辣。通常開這種玩笑的男性，除了苦笑倒像是有幾分驕傲。如果要我評論，四川（包含重慶）的女性地位可能並不亞於上海女性；相較於後者因近代就業結構變化而形成的女性經濟地位提昇，四川的辣可能更接近未經馴化的狂野自然。當川妹子嗆辣起來，氣勢之狂，男性通常沒什麼回

嘴的餘地，以至四川、雲南、貴州都有一個詞——「pā 耳朵」，形容怕太太的男子，深得其形。川劇中的小丑劇經典《皮金滾燈》，描訴這種「pā 耳朵」的情形，即為此中代表，至今仍幾乎夜夜在飯館戲臺上演。

由這些地區皆位於「邊疆」，至漢代始浮現於「正統歷史」來看，可能也反映了人們對於邊地婦女較不受禮教管束的想像。這些外圍邊地直至今日都是少數民族最多的地區，正如同《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》中那些「沒有歷史」的人，看在歷史的書寫者，尤其是王朝官方的史家眼中，這些內部的邊緣人和更外圍的異邦人，都是不需（細）寫入歷史的人群，只有當天朝皇威能獲得彰顯時，才有被書寫的價值。文字、文明、（書寫的）歷史、禮俗傳統的知識交換，都成為可施用的工具，一層一層邊緣化地理、政治、族群、生理性別上的弱勢。

在這之中，有別於其他西南諸族，巴蜀是「較近的異族」，或世界體系理論中介於中心與邊緣的「半邊緣地帶」（semi-periphery），相較於更遙遠而難以碰觸的異邦，勉強有種可指認的「漢化」跡象，或許也有化「生」為「熟」的可能（葛兆光，2019）。巴蜀之外，儘管《史記》以降均提及尚有六夷七羌九氐等種種部落，他們的界線與區別既不固定，可能在史家眼中也

並不重要。在這裡，被書寫的對象只是一群無法理性表述的無聲者、漢人獵奇窺探的對象。所謂異己或邊緣無非是相對而言，由內而外層層外推（王明珂，2003）；在歷史與文明的邊緣之地，相較於男子，女性更是外於文明的。但有無可能被禮教綁縛的文明人，其實也羨慕或嫉妒著不用理性管束而任性妄為的「番邦女子」？對她們投射了野性大膽，但同時也是大力有為、振興國族家業的期望。

二、故事中的女性

（一）辣女典型

事實上，這種「辣女」的典型，大概是可以從或虛或實的書寫中看出端倪的。在正史、野史中，都曾出現以特殊女性為主角的片段，從卓文君、鮑三娘、祝融夫人到秦良玉，這些虛實交雜的人物所反映出的形象，摻雜了人們對於邊疆地區層層由內而外，女性愈加不符合常規的想像。這些人個性奔放大方：卓文君身為煉鐵巨賈之後，家僮八百，能不畏俗世眼光及嚴父反對情奔司馬相如，事跡不但引起司馬遷的興趣，杜甫也為二人的故事吟詠《琴台》一詩，令後世文人歌詠不絕。太史公的記述下，卓文君並不是溫順文弱的寡居婦人，而是大膽決斷的，她也具備商業手腕、善知父親軟肋，終使得父親妥



協。相較於此，做為男性的司馬相如雖然也同為蜀地人士，卻是善於弄琴、辭藻華麗的才子與「中央官員」，他無疑是更接近「文明」狀態的。

「琴台」如今成為成都市路名，成都人歷來都相信西門外的土台即為司馬相如撫琴之所的「撫琴台」（1940年始經發掘確認為五代時前蜀皇帝王建陵墓）。二人曾經經營酒肆的臨邛（今邛崃），原來就以釀酒勝其名，現今更被當地鄉親視為招牌。邛崃雖然地處西南偏遠的地帶，算是邊緣的邊緣，但是盛產鹽、鐵，二者在漢代皆是重要的經濟命脈，也是通往南方絲綢之路的重要一站，這些都是足以翻轉邊緣身份的條件。數年前筆者至此考察考古遺址時，體驗到邛崃鄉親勸酒份外殷勤，座中女性不但無法以性別因素辭酒，相反更被期待應有不輸男子的酒「膽」與酒量。女性「好膽識」的形象和伴隨的事跡，都因後世的重塑與加強而餘留在一般人的歷史記憶與生活中，也影響其認同。

若我們繼續往外尋找，將能發現另一個典型——鮑三娘。

鮑三娘何許人也？玩過「真・三國無雙」系列遊戲的人，可能對這名以勇武著稱的武將不陌生。在《三國演義》八十七回中有一節描述關公第三子

關索，入軍來見孔明，自云自荊州陷落後曾逃難在鮑家莊養病；後於途中遇見孔明征南之兵，因而自請加入，奉孔明派為前部先鋒，一同征南。敘事中關索相傳是關公公子，自小失散而被索氏收養，在鮑家莊期間邂逅了鮑三娘，娶之為妻。在征討南蠻孟獲的過程中，二人立下不小的功勞，此後也又並肩作戰、仗義而為，故事廣傳民間。

儘管鮑三娘並非正史所載人物，就連關索也沒什麼記錄，但二人的形象卻十分鮮明，尤其在四川廣元還可見到鮑三娘墓，旁立有「漢將軍關索妻鮑三娘墓」、「四川省歷史文物保護單位」等碑文。當地傳言 1914 年間有法國人謝閣蘭（Victor Segalen，或有翻為色伽蘭）至此「考古」，鮑三娘的頭骨從此被取走，不知去向。謝閣蘭是一名海軍醫生，同時是考古學者／探險家／詩人／文學評論家／語言學者／民族誌學者。來到四川前他已隨著法國海軍去了許多地方，包含高更的大溪地，卻對中國文化懷有更濃厚的興趣，將其遊歷揉雜史實與想像，寫出多種相關書籍散文。

事實上，民初許多斜槓探險家、傳教士和學者，都曾到四川盆地邊緣的山區進行調查與傳教，蒐集了不少文物，也發現了一些考古遺址。謝閣蘭與鮑三娘的「相遇」僅是一例。他們比當

時的中國人更早認識到這些文化遺產的價值，雖然採取的手段以現今考古的標準來看不盡合格，也不免帶有種族優越的觀點或獵奇收藏的心態，卻為多處考古遺址與當時的居民生活情形留下珍貴的影像或紀錄，包含此處的「鮑三娘墓」及周邊人群。就地方民眾而言，三國演義中對於蜀國的正面評價，無疑加深了當地人對鮑三娘的認同感。鮑三娘是真實存在的，墳塋是也是真實的。

民間故事總是虛實交錯，鮑三娘雖然於史無據，但這些人物的出現可能反映大眾對於救衰起弊的渴求。在鮑三娘征戰南蠻的故事中，她所遭遇的是於《華陽國志》有所本的洞蠻孟獲，「（諸葛亮）凡七虜、七赦。獲等心服，夷、漢亦思反善。亮復問獲，獲對曰：『明公，天威也！邊民長不為惡矣。』…出其金、銀、丹、漆，耕牛、戰馬，給軍國之用…」。

說明南征除了平息邊民滋擾外，也有物資上的收益。其中孔明擒孟獲處不知所指，一說是危關（在今理縣），為近現代羌族所居地；孟獲墓則已入雲南，但若說孟獲即是羌族或彝族，則不盡然。實則孟獲所代表的是蜀地之外更偏遠的部族首領。其妻祝融夫人所代表的則是「番邦蠻子」中更遠離文明的番女，亦是女性部族領袖的典型，二者是部族間的聯姻結盟。三國演義說祝融夫人世居南蠻，為祝融氏之後，傳說也和由楚入滇的莊蹻有關，

反映其部族位於巴蜀之外的偏遠之地，可能是滇，但又曲曲折折地暗示她身為中土苗裔流落在外的血緣聯繫。在民間故事中，她比丈夫勇猛有智謀，不按牌理出牌的應戰方式差點就打亂了諸葛亮的盤算。在一般漢人經常貶低「蠻子」、輕忽女子的風氣下，三國演義創造出這位智勇雙全的女性，顯得奇特而引人注目。或許更突顯蜀軍南征一事，以文明「馴化」不文明所費的周章與收穫的可貴。

以女性為部族首領，出現於漢人所敘佚事中，反映了漢人對此的難以料想與驚奇。但這種情形在邊疆民族可能並不特別，可見諸文獻史料，甚至考古器物中。例如胡曉真（2019）提到明清敘事中二位曾經名重一時的西南女土司（奢香與秦良玉），因為事功於朝廷而進入正史的視野。《黔苗圖說》中也繪有具有威望的女土司形象。其實土司制度作為邊疆治理的策略運用頗為成功，然而除了史書裡中央政府管制與籠絡並行的官方視角，我們亦不應忽略地方貴族如何在不同的族群力量間折衝，營取自身族群利益。在漢人的敘事中，女性領袖雖然並未失去女性的特徵，但從其被讚揚的事跡，仍顯露出傳統漢人所讚賞的男性特質——果決、勇敢、機智、謀略與遠慮。至 20 世紀，儘管土司制度早就式微，仍可見例如涼山彝族的世襲女土司楊代蒂（1923-2013）受到當地民



眾跪拜迎接的紀錄，又說其有威儀、常配槍，以震懾周圍環伺的多方族群勢力。這種世襲制度並不獨厚男子，女子也能接受培養、寄予厚望，例如楊代蒂自幼便被送至成都就學，直至代管土司事物的姨母病重，轄地需人管轄始回。及長，她的成婚對象則是另一名土司，反映彝族貴族只和貴族聯姻的婚俗，以及又一次的部落結盟，至今仍可見其脈絡。

（二）無名的婦女

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無疑已經吸引許多研究者的目光，但在近代民族誌調查或人類學者進入前，我們還可在歷史文獻、文學作品或民間說唱故事中，見到一些隱隱浮現的婦女景象，她們可以身為貴族，或在因緣際會中因為鮮明的個性而得到凸顯，就像上述的幾個辣女典型；但更多時候是名不見經傳卻具有關鍵性角色的無名婦女。據《鹽源縣誌》所載：「鹽井開於西漢…歷五代而終宋，夷疆久已荒蕪…無有知其處者。乃有牧羊夷女，蓑笠而習飲池之故，既知齊水，乃事牢盆，至今祀之，如玉女神焉。」又提到：「開山姥姥，塌耳山夷女。…唯司牧羊之役。羊飲於池，跡之，見白鹿群游，嘗其水而鹹，指以告人，因掘井汲煎，獲鹽甚佳，即今之白鹽

井也。…至今祀之。」
故事中無名的牧羊夷女，因與動物親近，故能透過自然界的動物本能，意外發現天賜珍貴的鹽泉，又被附以種種神蹟，最終受人祭祀。

如今在鹽源的「開井娘娘」廟雖已毀壞但仍可見其遺跡，原廟內所塑夷女的形象據說與當地納日（納西）族婦女重疊。

關於鹽與女神的連結，或可視之為女性與未經馴化的大自然的連結，也可見於巴族的廩君神話中，鹽水女神以資源的代表和管理者的姿態出現，告之廩君當地富於魚鹽之利，願共留之，但最後被廩君所射殺。在這些同樣盛產鹽的地區，或許就像許多考古文化中所看到的女神崇拜，女性的生殖能力與豐饒、盛產連結，也被想像為更接近動物與自然。及至近現代，部分少數民族世居之地，製鹽的勞務



1 這些貯貝器多半出於滇文化的大型墓葬，盛於西漢之時，可能標誌了特殊的身份，例如其中一墓出有滇王金印。



圖 1：紡織場面貯貝器（局部）（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，1993，cl 4）

圖 2：紡織場面貯貝器（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，1993，cl 3）

圖 3：殺人祭柱場面貯貝器（局部）（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，1993，cl 17）



仍主要由婦女承擔。不獨製鹽如此，根據民族誌的觀察，婦女也經常是其他手工業的勞力來源，尤其紡織與製陶。經由考古器物呈現出的圖像，有時也能幫助我們略窺這些女性的身影。例如墓葬中時而可見到女性墓主隨葬

紡輪的例子。這些勞務情形意外在西南地區獨具寫實風格的考古器物上保留下來，如在雲南滇池旁石寨山考古遺址發現的青銅貯貝器¹上，塑造了許多祭祀、狩獵、紡織的生活場景，描繪翔實仔細。以二個紡織場景的貯貝器來看，場中全為女性，眾人皆席地，獨有一人敷座而坐（圖 1），或坐於銅鼓之上（圖 2），而有別於其他人。場中人物大小有別，為首者不僅身形略大，還以鎏金凸顯其身份；二個場景中這名特殊的女性都正在接受他人奉獻。另一個以祭祀為主題的貯貝器上，則獨有一女性乘轎者（圖 3），在等待殺殉且多數為男性的人群中顯得更為



圖 4：在考古工作現場，女性經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，從需要細心從事的繪圖、清洗文物及室內整理，到需要大量體力的發掘工事，還有照顧全隊飲食的煮飯工作，她們也是考古工作中的無名英雄（作者攝）



特殊，許多研究者相信其為主祭者。這些場景描繪寫實，有無字史書之稱；儘管觀者揣想當中角色個性無法如讀文字般鮮活，女性於其中做為主角地位崇高應是清楚的。

三、發掘故事的女性他者

面對少數民族婦女的性別角色與處境，尚有來自於近現代人類學者及攝影家的視角，例如針對著名的摩梭人所進行的田野觀察，在此便不贅言；但當地社會因觀光化之後過份被觀看所產生的變化如何，則值得注意。

另一方面，擅於發掘物質文化背後社會意義的考古學者，也逐漸注意到邊地與其他文化核心展現出何種對話與拉鋸。在謝閣蘭至四川、雲南探險考古，卻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被迫離開後若干年，中國學者終於也開始探索這片廣大西南夷占居的地區，諷刺的是，將他們帶至此的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。

在 1940 年代撤退至大後方的中國學者中，包含了任職中央研究院與中央

博物院籌備處的諸君，他們將大批書冊、數年前甫經西式科學考古發掘所得，連同收購的文物，輾轉運送至西南地區，終於在李莊安頓下來，有餘力再進行學術調查。此時調查的對象也很自然地轉向西南地區，這片遠離歷來中央政權的「邊緣之地」。儘管已受到外國探險家的諸多青睞，在中國也時值新學科的設立，但在過去還排不上中國考古學者研究「國族歷史」的優先之地。但或許戰爭也讓他們無從選擇，惡作劇般地將國族歷史的舞台帶往邊緣。南渡的學者開始組織隊伍，進入過去外國傳教士到過的山區調查。1940 年凌純聲組織了川康民族調查團，由李莊出發經灌縣、龍溪、汶川、威州，進入理（番）縣（凌曼立，1963）。雖然少數族群的調查對人類學者來說並不足奇，但若非抗戰偏安的原因，這樣的調查團恐怕不會這麼早發生。考古方面，以殷墟為主軸的發掘早已被迫中斷，文物南遷的同時，工作的標的也半被迫轉向，然而這樣的轉向與三國時期的蜀國一樣，都使西南地區獲得被注目與經營的機



圖 5：四川彭山漢代崖墓發掘團隊，1941 年攝於發掘駐地；左起吳金鼎、王介忱、高去尋、馮漢驥、曾昭燏、李濟、夏鼐、陳明達（南京博物院編，1991）

會（雖則經營的成果也經常被外來強勢的一方所誇大）。稍早於凌純聲的調查團，中國第一位女考古學者兼詩人曾昭燏，便與其他同為第一代受西式教育的考古學者，共同開啟了雲南首次的科學考古。

身為曾國藩的姪孫女，曾昭燏與夏鼐同年赴英國倫敦大學求學，又與吳金鼎同樣師從葉慈，後至德國博物館實習。回國後便至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任職。1939 年她與吳金鼎、王介忱共同在大理縣蒼山先後發掘馬龍、佛頂（甲、乙）、龍泉、白雲等 5 處遺址，並命名為「蒼河文化」，1942 年編成《雲南蒼洱境考古報告》，成為雲南首部考古報告；這也是雲南史前文化序列首次獲得揭露。據說當地居民素來皆是女性下田耕作，男性不下田，因此考古團隊僱得之發掘工人也均為女性，是真正的「女性考古」。證諸今日，筆者在四川所能僱得的工人，仍以女性為多

（圖 4）。

次年（1940）曾又與吳金鼎、高去尋、李濟、夏鼐、王介忱、馮漢驥、陳明達等組成川康古蹟考察團，發掘四川彭山漢代崖墓（圖 5）。這些崖墓，舊稱蠻洞或獠洞，多見於四川、雲南、貴州，在當地與少數民族聯想在一起，半是因為鑿崖洞為墓的風俗在東漢之後已漸被遺忘，後來便頗有遺世的邊緣人將崖墓改造為居室（徐堅，2012：346）。臺灣人類學先驅烏居龍藏，在 1902-03 年間對成都、重慶崖墓進行調查時，才首次指出蠻洞原有的墓葬用途；後謝閣蘭也對之進行過系統考察。或許孟獲和祝融夫人出身之處，也帶有這樣的地景？

發掘崖墓之外，同一年，曾昭燏與凌純聲一樣也深入涼山地區考察。她出入曠野、洞穴、山嶺，發掘條件刻苦倍於常人，連吳金鼎也稱其辛苦、為女中



異數。留守李莊期間，她又籌辦了歐洲舊石器展覽。二戰結束後，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遷返南京，隨即又籌辦了二次展覽——漢代文物展覽、青銅器展覽。戰亂貧瘠的日子雖然漫長難熬，但這是一個一人當關，一年當多年用的日子。運用有限的資源，這一代人也完成了許多令人佩服的工作。

國共戰爭，曾昭燏極力反對文物來臺未果，自己也對新政權懷有希望，於是留下執掌由中央博物院蛻變的南京博物院，由副院長再至院長；期間除為博物館徵集文物、持續主持江淮地區考古工作與寫作外，也在大學教授課程，名盛一時。然而最終在「四清運動」期間自殺死於院長任內，葬於自己曾經發掘的南唐二陵。並留下詩、文多種，由南京博物院輯成《曾昭燏文集》出版。

在命運的十字路口上，曾昭燏選擇了與摯友、親人不同的路，相信在新的政權下仍能繼續進行一心所繫的考古與博物館事業。她的戰友吳金鼎選擇了投筆從戎，最後從事的考古工作正是舊為撫琴台的「琴台整理工作團」（也即王建墓）。留下的，也各自有其選擇與結果，曾昭燏初始與夏鼐並稱「北夏南曾」，但卻提早結束人生。在邊地的考古發掘以及村寨中，她應該看到西南地區奔放的藝術創作與民情，相對於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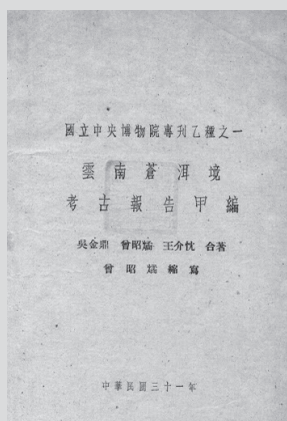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6：雲南第一部現代考古發掘報告，也是首次女性考古（吳金鼎、曾昭燏、王介忱，1942）

國早期剛剛開放還未定型的社會風氣，與她既有舊學又是留洋的背景，也許她也曾感受到文化震撼？我們也很難知道，在一幫男性學者之間，單身的女性學者，是否容易受到貶抑、排擠？是否有所不便，或是受到更多照顧？

事實上，西南時期常與她一同工作的，還有另一名女性——王介忱。她是「龍山文化發現者」吳金鼎的夫人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陳列館，無日期），卻由於吳的名聲總是為其所遮蔽。如今是輩凋零，我們對其了解更為有限。僅能從《雲南蒼洱境考古報告》一書中（圖 6）知其應是用力不少。從《四川彭山漢代崖墓》書中，也僅能由前言後記勉強尋得當時各人極為簡略的工作狀況。我不禁揣想，當時曾昭燏和王介忱是如何在發掘現場指揮一班娘子軍的？她們說的是何種方言？聊的是國家大勢或物價指數？



參考文獻

-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陳列館（無日期）〈發現龍山文化——吳金鼎（文物館週記 080）〉。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》。取自 http://museum.sinica.edu.tw/education_detail.php?id=107
-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（1993）。《中國青銅器全集 14：滇、昆明》。北京：文物出版社。
- 王明珂（2003）。《羌在漢藏之間：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》。臺北：聯經出版社。
- 吳金鼎、曾昭燏、王介忱（1942）。《雲南蒼洱境考古報告》。四川南溪：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。
- 南京博物院編（1991）。《四川彭山漢代崖墓》。北京：文物出版社。
- 胡曉真（2019）。《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》。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。
- 凌曼立（1963）。〈四川理番縣佳山寨史前拾遺〉。《考古人類學刊》，21-22：80-121。
- 徐堅（2012）。《暗流：1949 年之前安陽之外的中國考古學傳統》。北京：科學出版社。
- 葛兆光（2019）。〈化「生」成「熟」？——從清代「苗蠻圖像」思考民族史研究中的問題〉。《古今論衡》，33：3-33。